

西瓜船

戴勤锋

西瓜船，顾名思义就是运输和贩卖西瓜的船只，在交通还不十分发达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西瓜船是往来于城乡之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那时，我家住在城东的后塘河边，每年进入夏季，许多来自东吴、小白，甚至北仑等地的西瓜船，就会沿着河道从我家门经过。那些西瓜都是瓜农们大清早从田里摘来的，为了保证质量，他们还要急着赶五六十里的水路把西瓜及时送到市场，瓜农的辛苦可见一斑。东乡产的西瓜，大都是运到江东杨柳街一带的简易码头上，然后由小贩们用黄鱼车、手拉车等运输工具，再卖到城市的各个角落。到了西瓜旺季时，西瓜船从杨柳道头一直停靠在张斌桥下，岸上的西瓜更是堆得像一座座小山。卖瓜的、买瓜的，车来人往，真是好不热闹。

不过，也有些瓜农不愿去凑这个热闹，为了多赚几元钱，专门到一些沿河的村庄去卖。当船停靠河埠头后，船上的瓜农就会在村子里边走边喊：“河埠头有西瓜好买喽——正宗小白西瓜喽！”小白西瓜是那时的“名瓜”，主要产于东乡的天童一带，由于皮薄、瓤甜、汁多，深受城乡居民的喜爱。记得有首《宁波特产歌》唱道：“鱼米之乡是宁波，资源丰富特产多，奉化蜜桃只只大，慈城杨梅箩箩带，小白西瓜上山坡，邱隘咸芋扁缸做，樟村贝母名气大，还有三北大泥螺。”可见小白西瓜名气之大，绝不亚于现在的洞桥八戒西瓜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水果在农村是比较稀罕的消费品，尤其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平时都把自家种的番茄、脆瓜、黄瓜等当水果吃，好不容易来了西瓜船，再节省的父母也会买上几只给孩子尝尝。于是，村里人都往河埠头赶，一时间，河埠头成了热闹的西瓜市场。买卖免不了有一番讨价还价，但大家都是农民，知道种田的辛苦，象征性地还一两天钱后，少的三四只，多的十几只，就陆陆续续地往各家搬了。看到生意好，瓜农们自然也很高兴，有时还会主动帮你把瓜送到家里。

西瓜船在为大家送来口福的同时，也给我的童年带来过许多快乐。傍晚时分，正当我和伙伴们在河里戏耍的时候，一艘艘西瓜船也披着夕阳的余晖回家了。瓜农们有的靠在船头聊天，有的坐在船尾盘点着一天的收成，看到邻船上有熟人就相互打着招呼，爽朗的笑声与欸乃的橹声交织在一起，就像一首绵长的歌谣在金色的河面上久久回荡。有些船从我们旁边经过时，会扔下几只卖剩的西瓜来，刹那间水花四溅，西瓜像篮球一般在孩子们手里传来夺去，经过一番激烈的“拼抢”之后，大家就会嘻嘻哈哈地游到岸边一起分享这意外的收获。虽说剩瓜不一定甜，但农人那种特有的淳朴与温情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前些天，听到小区里有西瓜叫卖声，出去一看，河边竟然停靠着一艘久违的西瓜船。瓜农说是自家种的黄瓢小西瓜，价格也比水果店要便宜很多。买来几只一尝，果然脆甜多汁，有点当年小白西瓜的味道。现在物质条件好了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西瓜；但这艘西瓜船的到来，却唤醒了内心中许多美好记忆。

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 5649 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杨梅山上的童趣

吉成

俗话说，“少年外婆家”，我小时候最喜欢去外婆家了，特别盼望每年的“夏至杨梅满山红”的时候，同表姐、表弟们一起去杨梅山上看管杨梅。

外婆家的杨梅是本地的三个品种。一是成熟早，成熟时色泽乌黑，果汁多，酸甜适中，我们称之为“木坑”杨梅的“荸荠”杨梅；二是肉质较硬的紫红色的“盘松”杨梅；三是个大、成熟时粉红色中透紫的“大吞”杨梅。我最喜欢的是“大吞”杨梅，不只是喜欢它个大，味甜而鲜，更因为它的成熟晚，比“荸荠”杨梅的成熟期推迟了半个多月。看管“大吞”杨梅时，正赶上放暑假，正好整天呆在杨梅山上吃个饱。

杨梅成熟的季节是杨梅山在一年中最具活力的季节：清晨，刚近山脚未及进山，从山上传来的此起彼伏的呼朋唤友声，嘻嘻哈哈的笑闹声；扑入眼帘的，是飘拂在山间，如白色罗纱帐般掩映的淡淡晨雾中，缀嵌着星星点点红色、紫色的一丛丛墨绿色杨梅树；自山脚绵延向山腰深处，一拨拨来山上吃杨梅、摘杨梅的人在山道源源不绝……

每家每户的杨梅树丛下都铲除了杂草，地坪一概被其主人家修理得干净平整，仔细的人家还铺上了草席，为的是方便收集掉落地的果实。而看管杨梅的多待在附近的看管棚里，当年外婆家的看管棚就搭在一株大桂花树下，骨架是树干，盖顶的是芦苇编织的草帘，棚里面的地上一角铺了草席。看管棚除了让看管的人居留外，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避雨。在杨梅成熟的季节刚好是江南的“梅雨”季节，穿上蓑衣，戴了竹笠帽的人不怕雨，但离开了枝干的杨梅娇贵，一淋雨就掉价。有了这个棚，摘下的杨梅就会进棚避雨。

在看管棚里当家的都是清一色的孩子家。每当杨梅成熟时，几乎家家户户有亲戚到山上吃杨梅，因的

杨梅树密集，多有误采到邻家的，这时看管的小主人都会信奉一条“吃不论，拿不肯”的不成文的规矩，绝不会让来客难堪。

“盘杨梅”是杨梅山上沿袭的一宗买卖双方在现场预先估算的交易，卖主基本上是那些家中缺少正劳力的人家，而买主多是外地来的客商，担任估算的中间人则是请本乡本土中有经验的公道长者。当杨梅树上结的杨梅果子渐趋圆润、泛显红色时，这宗买卖就开场了，估算者根据杨梅树上杨梅的品质，能“上篮”的杨梅的实际数量，以6折计树上的挂果重，然后，在综合上年的市场价、本年的预测价基础上，商定双方认可的价格，从而确定“盘”妥的金额，买主当场向卖主付全额若干折扣的定金，余款在杨梅收获完后付清。“盘”过的杨梅树上的杨梅就由这些“盘客”自己来采摘。在看管棚里的小主人“看管”的就是这些“盘客”，防止他们“越界”来“顺手牵羊”。

在杨梅山上，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——摘最好吃的杨梅，落地的杨梅一概不吃，专挑树上果大、色纯的“挑子杨梅”，攀爬上树去吃个够，再摘兜下树来储在草棚里“流水”享用。

我们在杨梅山上的又一项工作，是同大人一起往挑运下山的杨梅篓里装杨梅。外婆家的杨梅出路如同当地农户，除了一部分馈赠亲友及浸几瓶家常的烧酒杨梅外，舅舅和舅妈也挑去交易，零售的挑到柴桥街、穿山道头、大榭渡口去，成批卖掉则在后所村集中的“城门头”集市上。但舅舅挑去“以物易物”的“下山”（桃花、六横等海岛）地方的杨梅篓里的杨梅，是绝不会“劳驾”我们，让我们“染指”的，舅舅说：“渔民兄弟们热情，豪爽，做人要心以心换心，赤诚相待，去下山的杨梅篓里的杨梅都要底和面一样，只能看眼。”每年，舅舅挑去的是杨梅，挑回的往往是虾皮、“烤头”、乌贼鲞、黄鱼鲞等干货“咸下饭”。



又见杨梅满山红

潘群飞

这个双休日，菜场门口多了一排竹篮，绿色的蕨草下，紫红的杨梅若隐若现。杨梅又红了。

小学毕业那年，村里分田分山到户，我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杨梅树，共两棵，在离家大约二三里的上林湖山上。于是童年的春光里，又多了一份令人心焦的等待。经过绵绵细雨的滋润，温暖山风的抚摸，初夏阳光的照耀，杨梅的脸终于红了。星期天，吃过午饭，瞒着父母，骑着叔叔家的永久牌自行车，带着堂弟兴冲冲地上山去了。上坡，下坡，七拐八弯，在管山老人的指点下，终于找到了自家亲爱的杨梅树。一棵形如绿伞，年纪尚小，杨梅长得不多。另一棵是老杨梅树，树干粗壮，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，万绿丛中点点红。我们迫不及待，绕着杨梅树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不一会，随手可摘的紫色杨梅大多在我们眼前消失了。目光移向高处，瞥见枝头缀着一些乌紫杨梅，在绿叶间若隐若现，随风颤动，我立即脱下布鞋，跳上树，小心地把它们一颗一颗收入囊中。饱餐一顿后，我们躺在草地上美美地休息一会，享受山岚的轻抚，聆听小鸟的歌唱。

夏至杨梅满山红。这是杨梅山上最热闹的时候。村里的大人小孩欢聚山上，边采边吃，说说笑笑，气氛轻松欢快，杨梅山变成了绿色的大杂院。清新的山风从身边缓缓吹过，阳光钻过绿叶的缝隙，投下明亮倩影。每年总有几个正在搞对象的小伙子在树上起劲地爬来爬去，为寻觅挑选送往未来丈母娘家的好杨梅兴奋忙

碌。邻居们见状，也会热情地邀请他们到自家的树上挑摘一些。我提着小篮子，在树下寻寻觅觅，搜索到陷在草丛里的好杨梅，“呼呼”吹去灰尘，扔入口中。父亲摘到特别乌黑的大杨梅时，总会大喊一声“来了”，把杨梅从树上扔向我，我立即抬头张嘴去迎接。有时杨梅打在额头上，弄得“鲜血”满脸，顿时，树上树下笑成一片。

杨梅到家后，父亲总先盛一大碗摆在桌中间，燃起香火，供奉祖先。然后让我端一碗给后面小屋里的孤寡阿婆，他自己也笑眯眯地端几碗给要好的邻居送去。母亲忙着挑选出新鲜稍硬的杨梅，用冷开水洗净，沥干，放进盛有烧酒的玻璃瓶里。烧酒杨梅是解暑去痧的佳品。可惜，往往不到盛夏，杨梅就被我偷吃了大半。

后来去县城上高中了，杨梅时节周末回到家，父亲不让我跟他去杨梅山，嘱咐我在家复习迎考。他大清早拿着带钩子的竹竿独自上山，快中午时，挑着两篮杨梅回来了，肩上的扁担悠悠颤动着。邻居见了，开玩笑说，儿子这么大了，你还要摘给他吃！父亲用袖子擦擦湿湿的额头，只会呵呵地憨笑。回校时，他还不忘让我带一小篮，与同学一起分享。

又见杨梅满山红，可我家的杨梅树早就在十几年前，在采石场的炮声中轰然倒下。那个常给我摘杨梅吃的人几年前也已离我而去。如今，杨梅每年仍会吃一些，只是不如从前那么起劲了。



永均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4

穆赫辛是萨达姆时代典型的“蛀虫”，虽然只是个中等级别的办事员，但那个时候，所有外国记者都得拍他马屁。比如你想在新闻发布会上找一个好机位，或者在密密麻麻的记者群里得到一个提问机会，就得给他“上供”。他火到什么程度？过生日时，办公室里记者们送的花儿有十几把，蛋糕成摞地堆在那儿，想贿赂他的人，每天络绎不绝。

从安置帐篷，到安放海事卫星，再到联系采访伊拉克官员、联系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，我多次跟穆赫辛打交道，也就熟识了。时间长了，隔三岔五，你不见他，他还想你呢，常常派人来找我，老远就喊：“Shui, Morhsin wants to see you. (水，穆赫辛想见你。)”

我一听，坏了，又得“出血”了，就揣上50美元去了。闲聊片刻后，他用阿拉伯的握手方式道别，我就从兜里把手拿出来，手心里捏着美元，说：“哈比比(阿拉伯语，‘亲爱的’)，那就非常感谢了。”一握手，他就从我

手里把那50美元给拿走了。

有一次，穆赫辛又派人来叫我，我正想找他帮忙联系采访伊拉克副总理阿齐兹，探听紧张局势下萨达姆高层的口风，便一路小跑到他办公室，只见他神色诡异：“哎，水，过来！”

我凑过去，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穆赫辛压低了声音问：“你们中国有‘伟哥’吗？”

我一愣，心想，嗨，这个可真没有！但我有求于他，只能咬牙说：“有！”

他怕我没明白，又解释道：“就是你们中国的中药，那种东方的，能激发人的……”

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有、有、有！”

穆赫辛立刻兴趣盎然：“那你给我弄点儿。”

我满口答应：“行！没问题。”接着提出交换条件，“副总理的那个采访，你是不是能……”

他很豪爽地说：“没问题！包在我身上。”

回去之后我就犯了愁，跟冀惠彦嘀咕：“穆赫辛跟我要‘伟哥’，咱上哪儿给他弄去啊？”回绝他肯定不合适，我就想，能不能糊弄他一下。

我问冀惠彦：“你带的药里边，有没有上面没英文字，也没中文字，人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的？”冀惠彦是个特别细心的人，他给我们报道组成员准备了一个

常备药箱，每天早上都会敲门，给每个房间送三片黄连素，预防水土不服闹肚子。

冀惠彦想了半天说：“有种藿香正气胶囊，把盒子拆了，里面的胶囊上没字儿。”

我有点担心，问：“这个药吃了，有没有什么副作用？”

冀惠彦笃定地说：“就是调节肠胃、防止上火，没什么副作用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。”

于是，我揣着藿香正气胶囊，钻进穆赫辛的办公室。他一使眼色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很神秘地说：“马库姆什盖勒(阿拉伯语，‘没问题’)！”

当时穆赫辛办公室坐着一些找他办事的人，他招呼我先坐下，然后就开始急急忙忙地打发那几个人。等他人都支走了，我既矜持又神秘地把药塞给他，说：“这是我们中国最好的Chinese Viagra(中国‘伟哥’)，一次两片儿。”我还是有些担心，怕他吃多了会出什么问题。

接下来两天我都没敢见穆赫辛，一方面忙于采访，另一方面我也心里没底，生怕这家伙识破了大发脾气：“水，你怎么糊弄我，完全没有效果啊！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